

中|国|史|学

仓修良 主编

■ ZHONG GUO SHI XUE MING ZHU PING JIE



● 山东教育出版社 ●

名|著|评|介

第二卷

K072
7-1
仓修良

主编

92503

中国史学名著译介



200204402

周谷城题



鲁新登字2号

中国史学名著评介

第 二 卷

仓修良 主编

*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6.75印张 5 插页 356千字

1990年2月第1版 1995年7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811—3,810

ISBN 7—5328—0852—1/K·24

定价 25.35 元

总目

第一卷

尚 书
春秋与左传
国 语
战国策
史 记
汉 书
东观汉记
汉 纪
三国志
后汉纪
后汉书
华阳国志
宋 书
魏 书
梁书与陈书
北齐书
周 书
隋 书

晋 书
南史与北史
史 通
贞观政要
通 典
元和郡县图志
唐会要
旧唐书与新唐书
旧五代史
新五代史

第二卷

资治通鉴
通 志
续资治通
鉴长编
三朝北盟会编
建炎以来系年
要录

通鉴纪事本末
资治通鉴纲目
文献通考
辽 史
金 史
宋 史
蒙古秘史
元 史
国 榷
罪惟录
读通鉴论
明史纪事本末
读史方輿纪要
明儒学案
宋元学案
明·史
十七史商榷
廿二史考异
廿二史劄记

续资治通鉴

文史通义

第三卷

畴人传及其

续编

圣武记

海国图志

蒙古游牧记

碑传集（附

续、补、三

编）

夷氛闻记

朔方备乘

小腆纪年附考

中西纪事

明通鉴

湘军志

东华录

新学伪经考

日本国志

元史译文证补

大同书

中国古代史

中国历史教

科书

历代舆地图

清朝续文献

通考

蒙兀儿史记

新元史

中国历史研

究法及补编

中国近三百

年学术史

（附《清

代学术概

论》）

古史新证

中国文化史

DQ86/01

目 录

资治通鉴	陈光崇 (1)
通 志	姜曾泉 (27)
续资治通鉴长编	徐 规 (41)
三朝北盟会编	仲伟民 (57)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吴怀祺 (79)
通鉴纪事本末	顾吉辰 (95)
资治通鉴纲目	叶建华 (113)
文献通考	王瑞明 (129)
辽 史	韩志远 (153)
金 史	崔文印 (165)
宋 史	周生春 (183)
蒙古秘史	黄时鉴 (207)
元 史	邱树森 (223)
国 榷	陈其泰 (245)
罪惟录	陈仰光 (261)
读通鉴论	朱仲玉 (279)
明史纪事本末	陈祖武 (301)
读史方輿纪要	仓修良 (319)
明儒学案	仓修良 (343)

宋元学案·····	仓修良	吕建楚 (381)
明 史·····	汤 纲	(403)
十七史商榷·····	刘伯涵	(425)
廿二史考异·····	施 丁	(449)
廿二史劄记·····	王树民	(467)
续资治通鉴·····	周宝珠	(485)
文史通义·····	刘汉屏	(497)

资治通鉴

陈光崇

(一)

在中国文化的宝库中，司马光编著的《资治通鉴》是一部特别值得重视的古典历史名著。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据说是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的后裔。他的父亲司马池以进士起家，官至三司副使、天章阁待制，是一个清廉正直的官吏。这对司马光的为人，具有重要的影响。

司马光从小爱好史学，7岁时听人讲《左氏春秋》之后能复述大意。他学习时，不但注意熟读课文，还要求懂得书中所说的道理。他说：“书不可不成诵，或在马上，或中夜不寝，时咏其文，思其义，所得多矣”。（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他还主张读书要自强不息，说“君子好学不厌，自强不息，推之使远，廓之使大，耸之使高，研之使深”（《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68《四言铭系述》）。司马光正是这样孜孜不倦地刻苦学习，因而很早便表现出过人的才华。知识既很渊博，文章写的也好，淳深古朴，有西汉的风格。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司马光20岁就考取了进士，以奉礼郎为华州判官。那时司马池正在杭州做官，他为了省亲的方便，请求改签书苏州判官事。但不久他的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在家服丧达五年之久。这期间，他闭户读书，写了好些论史的文章，如《十哲论》、《才德论》、《廉颇论》、《龚君实论》、《河间献王赞》等，还有史评十八首，开始了他的著述之业。

庆历四年（1044），司马光丧服满了，任武成军判官。不久，入为大理评事，补国子直讲，迁本寺丞。皇祐元年（1049），因枢密使庞籍的推荐，召试为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在充任贡院属官时，第一次认识了才华出众的筠州进士刘恕。皇祐四年，迁殿中丞，除史馆检讨，编修日历，开始当上史官。至和元年（1054）庞籍以户部侍郎出知郓州（山东东平），旋改并州（山西太原），先后辟司马光为郓、并二州通判。嘉祐二年（1057），司马光由并州入为太常博士、直秘阁，迁开封府推官，度支员外郎判勾院。嘉祐六年，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读、知谏院，从此做了七年的谏官。英宗时，进龙图阁直学士，判流内铨，开始设局編集《资治通鉴》。神宗即位，擢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御史中丞。

司马光踏上仕途以后，特别在担任谏官以后，一直是忠于职守，勇于谏诤，凡有关国家利害，大至帝王继统、政治举措、官吏进退、生民休戚，小至皇帝起居、宫廷生活等，无不尽心献替，慷慨陈词，指陈是非得失，很多意见得到朝廷的采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光关于君德和御臣的言论。他在初除谏官时向仁宗进言说：

窃惟人君之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姬煦姑息之谓也。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烦苛伺察之谓也。知道谊，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强亢暴戾之谓也。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三者兼备，则国治强；阙一焉则衰，阙二则危，三者无一焉则亡（《司马光奏议》卷3《三德》）。

又说：

臣闻致治之道无它，在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赏，三曰必罚。……臣窃见国家所以御群臣之道，累日月以进秩，循资涂而授任。苟日月积久，则不择其人之贤愚而置高位；资涂相值，则不问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职。……此陛下所以南面孜孜，夙夜求治，历载甚久，而太平未效者也。今陛下诚能博选在位之士，不问其始所以进，及资序所当为，……皆度材而授任，量能而施职。有功则增秩加赏，而勿徙其官；无功则降黜废弃，而更求能者；有罪则流窜刑诛，而勿加宽贷。如是而朝廷不尊，万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请伏面欺之诛（《司马光奏议》卷3《御臣》）。

司马光在这里提出的为君、用人之道，他认为是“平生力学所得，至精至要，尽在于是”（《司马光奏议》卷21《作中丞初上殿劄子》）。后来他把这种主张概括为“修心治国之要”，用书序或札子的方式多次进给仁宗、英宗、神宗，可见这是司马光最重要的政治主张。司马光还撰写了《保业》、《惜时》、《远谋》、《重微》、《务实》，称为五规，献给仁宗，认为

“此皆守邦之要道，当世之切务”（《司马光奏议》卷3《进五规状》）。对于这些主张，他不但形之于奏牍，后来也都渗透到他的历史著作中去了。

宋神宗是一个年轻有为的皇帝。他看到当时积贫积弱的统治危机，毅然起用王安石实行改革。改革的问题虽然酝酿已久，但在如何改革的问题上统治集团的认识并不一致，因而出现了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反对派的矛盾斗争。

还在新法颁行之前的熙宁元年(1068)，司马光和王安石就有过一场激烈的争辩。那时因河北灾伤，国用不足，宰相曾公亮等建议举行南郊典礼时停止赏赐。神宗把这个意见交学士院讨论。司马光从节流方面着眼，认为“救灾节用，宜自贵近始”，主张停止赏赐。王安石则从开源方面着眼，认为“国用不足，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宋史·司马光传》），持相反的意见。第二年新法实行不久，司马光又和吕惠卿辩论，反对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和青苗法。接着又多次上章反对新法。宋神宗虽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但仍很重视他，任命他做枢密副使。司马光以意见不合，宁愿辞去高官，请求外任。熙宁三年秋天，便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次年改判西京御史台。从此住在洛阳，六任冗官，历15年之久。

司马光初到洛阳时，写了一首《书怀》诗，其中有“所存旧业唯清白，不负明君有朴忠”的句子，反映他以清白自居，以朴忠自负的风格和情操。这期间，他把书局迁到了洛阳，并且在洛阳尊贤坊北修建了一所住宅，叫做独乐园。每天在园中读

书著史，有时也与友朋往来，诗酒相娱，过着一种勤勉而又恬静的生活。

元丰七年（1084），《资治通鉴》告成，迁资政殿学士。第二年春天，宋神宗死了，哲宗以冲龄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听政。高氏素不满于新法，所以立即起用司马光为门下侍郎，司马光与吕公著等一道大力推行变更新法的主张，于是保甲、方田、市易、保马等法便被逐一废除了。元祐元年（1086）春，司马光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进一步废除了青苗、免役、将官诸法，便在这年九月去世，就这样结束了他与王安石进行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斗争。不幸的是，北宋的新旧党争不但没有因此结束，反而更加剧烈起来，这一点司马光负有一定的责任。

司马光学识渊博，自经史百家以至音乐、律历、天文、书数，无所不通。他的著作很多，流传至今的有《易说》、《资治通鉴》、《稽古录》、《涑水纪闻》、《法言集注》、《传家集》等，其中《资治通鉴》294卷，另《目录》、《考异》各30卷，是他毕生精力所萃的一部历史名著。

（二）

司马光为什么要编写《资治通鉴》？这有着学术的和政治的原因。

司马光对于史学，“自幼至老，嗜之不厌”。他在研究史学的过程中，发现当时史学方面存在着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没有一部比较简明完整的通史，使学习历史的人感到很大的困

难。他认为“《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不能尽其篇第，举世不暇毕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刘恕《通鉴外纪后序》）。为了挽救这种史学危机，司马光发愤编写一部新的史书。这部书必须是一要求简，二要求通，用以取代繁重的十七史。这是司马光编写《通鉴》的原因之一。

北宋中期社会危机日趋严重，内而民怨沸腾，外而辽、夏侵扰，国势阽危，岌岌不可终日，朝野上下响起了一片“求治”的呼声。“以史自负”的司马光，企图通过历史的编写，“叙国家之盛衰，著生民之休戚”（《通鉴》卷69附论），有选择地论述史事，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所以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希望宋神宗“时赐省览，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借以改进政治，安定国家。这是司马光编写《通鉴》的另一个原因。

还在嘉祐年间（1056—1063），司马光就计划要写一部编年体的通史。为此他首先编了一部上起战国，下迄五代的大事年表，于历代兴衰治乱之迹作了扼要的记载，名为《历年图》，共分5卷，在治平元年（1064）进给宋英宗。接着在这一基础上写成《通志》8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止秦二世三年，这就是《资治通鉴》的前8卷，进奏以后，引起宋英宗的重视。治平三年四月，英宗便命司马光设局于崇文院，自行选择协修人员，编辑历代君臣事迹。由于官府的支持，司马光克服了“私家力薄，无由可成”的困难，得以安心地从事这项艰巨的文化工作。治平四年，宋神宗即位，司马光进读《通志》，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

赐名为《资治通鉴》，并且写了一篇序文，鼓励司马光继续编写成书。

《通鉴》是一部集体编写的历史著作。在司马光领导的书局里，有主编，有协修，有书吏。主编就是司马光，协修是刘恕、刘攽和范祖禹，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检阅文字的工作。

刘恕字道原，筠州高安（今属江西）人。18岁中进士，官和川令。博闻强记，尤精史学。司马光奉命编书时，宋英宗叫他“自择馆阁英才共修之”。司马光说：“馆阁文学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得而知者，唯刘恕耳。”（《宋史·刘恕传》）因此奏调他为局僚。在《通鉴》协修诸人中，刘恕“功力最多”，不但“讨论编次，多出于恕”（《司马光奏议》卷38《乞官刘恕一子劄子》）。“遇史事纷错难治者”，也“辄以谏恕”（《宋史·刘恕传》），实系全局副手。

刘攽（1023—1089）字贡父，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人。博学能文，中进士后，做了二十年的州县官，才入京为国子直讲，著《东汉刊误》4卷，校正《后汉书》的错误很多，后来又参预《三刘汉书标注》的编写，是一位汉史专家。司马光起初奏调刘恕、赵君锡协修《通鉴》，赵君锡因父丧不赴，刘攽就代他担任了这个职务。

范祖禹（1041—1098）字淳父，一字梦得，成都华阳（今四川成都）人。少孤，育于叔祖范镇。范镇曾经参与《新唐书》的编写，历十七年之久，对唐史很有研究。司马光和范镇是好友，彼此过从甚密，很早就认识了范祖禹。祖禹“智识明敏，好学能文”（《司马光奏议》卷30《荐范梦得状》），

嘉祐末年进士，曾官龙水县令。熙宁三年，刘敞通判泰州，书局需人，司马光便奏调他同修《通鉴》，专职唐史。范祖禹入局的时间虽较晚，但他工作的时间却最长，直到《通鉴》成书，经历了15年之久。在洛阳时，司马光“专以书局委之”，故对《通鉴》“致力尤多”（顾栋高《司马温公年谱》卷5）。

司马康（1050—1090）字公休。敏学过人，博通群书，以明经擢上第。元丰元年（1078）刘恕卒后，司马光奏授康检阅《资治通鉴》文字，这时司马康29岁，从此便随从他的父亲参与修书工作。

《资治通鉴》的这个编写班子一共有五个人。他们都是志同道合，具有专门研究的史家。从年龄上看，自司马光以下，一个比一个小，形成一个精干的学术梯队。他们之间都有各自的分工。初期由刘敞负责汉史长编，刘恕负责魏晋南北朝史（包括隋朝）长编。司马光移官洛阳前后，分工作了调整，范祖禹负责唐史长编，刘恕负责五代史长编，刘敞接替刘恕剩下的南北朝部分工作。后来刘恕死了，五代部分由范祖禹完成。

《通鉴》的初稿，也就是各朝历史的长编，都由协修人员负责编写。司马光总其大成，对于全书的体例、书法，以及史料的考订，文章的剪裁，乃至句法的锤炼，都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使来源于各种不同时代，不同文笔的史料，熔铸于一炉，浑然一体，自成一家，充分发挥了主编的重要作用。

在编写《通鉴》的过程中，从开始收集资料到最后写成定稿，司马光还制定了一套严密的方法和步骤，为历史编纂学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经验。

《通鉴》的编写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把收集的史料，按照年月顺序，标明事目，剪粘排列起来，叫做丛目。丛目要求尽量详备，凡是各种史料“稍与其事相涉者，即注之过多不害”（《传家集》卷63《答范梦得》）。这是第一稿。第二步是把丛目中编排的史料，进行初步整理，经过选择，决定取舍，然后重新组织，从文辞上加以修正。遇有年月事迹相抵触之处，须加考订，说明取舍的理由，作为附注。由此写成第二稿，叫做长编。长编的写作原则是“宁失于繁，毋失于略”，以便作进一步的修改。丛目和长编都由协修人员负责整理编写，抄录则另有书吏。第三步由司马光就长编所载，考其同异，删其繁冗，修改润色，写成《通鉴》的定稿。刘恕的儿子刘义仲在《通鉴问题》中说：“先人在书局，止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可见《通鉴》虽由多人协修，而勒成删定，则全出司马光一人之手。

尽管由协修人员写成了长编，司马光的勒成删定，仍然是一番很艰苦的工作。他在给宋次道的信中说：

某自到洛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于今八年，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唐文字尤多，托范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丈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补。自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余卷，至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文献通考》卷193）。

从信中可以知道，唐史长编多达六七百卷，司马光至少花了四年的时间，才把它删定为八十一卷，正是由于《唐纪》

用力最勤，所以史料价值也超出了正史的范围。

司马光最注意考订史料。他在编写《通鉴》时，一件史事往往要用好几种材料参照写成，这样就难免要遇到记载的异同，史实的真伪。为了弄清事实，决定取舍，司马光提出了考异的方法，首先从长编做起。他对范祖禹说：“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事实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为了说明对史料取舍的原委，司马光还制定了一个撰写考异的公式：

先注所舍者云某书云云，今按某书证验云云，或无证验，则以事理推之云云，今从某书为定；若无以考其虚实是非者，则云今两从之（《与范梦得》）。

现存《通鉴考异》中的条文，大体上都是按照这个公式写的。

《考异》的条文，繁简不一，视情况而定。有的条文不过寥寥数字，如卷2汉灵帝光和六年“张角置三十六方”条说：“袁《纪》作坊，今从范《书》。”非常简单。有的条文则字数很多，如卷14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十二月丙午“颜杲卿杀李钦凑，擒高远、何千年，河北十七郡皆归朝廷”条，引用《河洛春秋》、《颜杲卿传》、《玄宗实录》、《肃宗实录》、《唐历》、《旧唐书》、《颜氏行状》等史书凡七种，考辨颜杲卿起兵反抗安禄山事实，全文2573字，是《考异》中篇幅最长的一条。当然这样长的条文比较少，但不管文字的多少，都可以看出司马光对待史料的严肃认真的态度。

长编中的考异，原注于正文之下，但经过司马光修定以后，把注文剔出，另成《通鉴考异》一书。后来胡三省注《通